

多让基层声音成“两会好声音”

2月2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正式向社会公布。这次人大代表的选举实现了“两升一降”的目标：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专业技术人员代表比例上升，党政官员代表比例下降。

公民通过选举代表来表达政治诉求，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内涵。可以说，平等的选举权是民主政治的灵魂。“两升一降”等代表构成方面的变化、进步，让民众有理由对2987名全国人大代表，特别是来自一线的400多名工人、农民代表充满期待。

当然，民众最关注的还是，自己的利益诉求能否通过代言人传递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体现在公共决策中。因而，众多新当选的基层一线代表，能否通过自己的积极履职，构建起民意与决策机关的良性互动机制，尤其值得期待。

需要认识到的是，基层一线代表数量大幅增加，只是一个开始。形式的平等很重要，但实质的平等更加关键。基层代表数量的增加，和基层民众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话语权的增加，并不一定是同比例提升的，这决定于广大基层代表的能力与素质，取决于有关部门能给基层代表提供怎样的制度支持。

基层代表要真正“代表基层”，还需要增强“基

层意识”。全国人大代表不是按职业和界别选举产生的，代表首先要对原选举单位负责。但是，基层代表们也必须清楚，他们的视角不能仅限于自己的单位，而是要延伸至更广阔的天地。最可能代言城镇里的市民或乡村里的农民的，就是基层代表。基层代表往往有着丰富的基层生活、工作经历，对诸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有着最直接、最真实的体会和感受，他们积极主动地反映民众的意愿，有助于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各位来自基层的代表，履职中未必一定要提出政策制定、法律修改等宏观的议案建议，但应当尽可能地忠实而完整地传递自己所属群体的声音和诉求。期待每一位来自基层的代表，都能有足够的“基层意识”，确定自己的代表角色定位与主要代言群体，承载起民众对他们的托付。

从国家层面，也有必要为基层代表履职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障。比如，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负责代表工作的机构，可以按照代表职业背景、关注领域等，组建若干基层代表小组，帮助他们确定部分基层联系点和基层群众，并为他们开设专门的微博或者网络平台，以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自己代言的群体，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他们的诉求。

(转载自《新京报》)

学生踩踏事件为何一再发生

□ 金明岩

上百名学生拥挤在楼梯口发生踩踏，导致4死7伤的惨剧。这是谁的错？校方有一套说法：事故发生时，尚未到开门时间，由于刚刚开学，学生比较兴奋。这就一下子把责任推给了学生自己。

当地老河口市政府迅速纠正了说法。2月27日晚6点，该市通报秦集小学踩踏事故，称因值班老师未及时打开宿舍大门，导致学生拥挤发生踩踏，教育局局长等6人被免职，秦集小学校长等2人被撤职。这一责任事故的定性，算是回到了事故本身的逻辑上，而不是睁眼说瞎话。由此可以进一步追问，学生为什么没有错呢？校方和教育部门到底有什么责任呢？为何这样的事故不能禁绝呢？

从众多群体踩踏事件发生看，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其实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当无数个体挤在一个逼仄的空间，无法对整个空间的安全情况作出判断时，往往都会选择对自己而言是趋利避害的方式，但这种选择必然发生内耗而导致行动的无序，悲剧往往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当此之际，破解这种必然性悲剧，只能靠外在的力量。

这种外在的力量，首先就在于空间的安全设计要科学合理，不致出现过度拥挤现象。在举行大规模群体活动时，这种空间的安全也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比如设在开阔地带，有多个安全出口，有分散人流的设施和举措安排等。从秦集

小学教学楼的现场照片看，四层高的教学楼，居然只有楼中间一个楼梯口，全体学生出动，拥挤就不可避免。

保证了源头的安全，还要有具体保障安全方面的制度执行。比如有专人的安全秩序维护，合理的安全疏散安排等。一旦发生紧急事故，有人可以疏散导引，不致使人流像无头苍蝇似的乱窜。秦集小学的直接责任就在于，大门该打开时没打开。

成年人在这种逼仄空间中，尚且容易发生踩踏，更何况学生？学生安全意识的建立，在于校方的安全教育到位。紧急情况下学生应该怎么做，学校必须拿出办法并教会学生，一年要进行一两次安全疏散演习。叶志平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让自己的学生在汶川大地震中无一损伤。每一起校园踩踏事故发生的背后，都有安全演习缺失的影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同时叠加，使惨剧发生了。从这些年的一些校园楼梯踩踏事故看，莫不与此三者同时作用相关。如果楼梯出口不止一个，人流就会合理分流；如果老师恪守安全岗位，就会及时引导人流；如果学校平时安全教育到位，学生的无序行为就会变成有序行动。秦集小学踩踏事故的发生再次表明，安全意识和教育很难变成学校的普遍性实践。教育部门和学校到底还要让学生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才能扣紧安全这根弦？

“毒”大米不能止于辟谣

□ 刘志权

中国的食品安全一直让人揪心。继肉(瘦肉精)、油(地沟油)、酒(塑化剂)等之后，大米近日也“中招”。有媒体报道，2009年湖南一万多吨问题大米曾经流向广东。尽管收购方深圳粮食集团公司2月27日紧急“辟谣”说当时已经追回湖南，但无法阻止民众浮想联翩。

“问题大米”的问题是镉超标。据称，镉在人体内富集，代谢期长达10到30年，超标时会损伤肝肾器官、骨骼、致癌，甚至影响生育。因此，国家对以镉为代表的食品重金属污染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并规定超标粮食只能用作工业用途。尽管目前真相还不得而知，但一个基本事实是，镉含量超标50%到200%的万吨大米，曾经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从湖南各地粮库汇集到深圳粮食集团，然后“失踪”了。

昔日大米今何在？如果不在广东的餐桌，它在哪里？

各执一词的罗生门事件，无法掩盖“问题大米”背后的老问题：粗放式管理和质监部门不作为。一方面，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检测项目均未纳入粮库检验范围；另一方面，明知粮食有问题，却听之任之甚至沆瀣一气。如果质监部门面对证据确凿的万吨“毒”大米，既轻率地出据检验合格证，又不在事后

监督其去向，那与警察当面放走罪犯或面对罪犯却不抓捕有何区别？

这一模式不陌生。在之前的瘦肉精事件中，也是生猪产地的质监部门拿钱盖章放行；而生猪收购和宰杀地的质监部门，同样拿钱盖章了事。只不过此次事件中，当事方不再是养猪场或宰杀点这样的“散兵游勇”，变成了国家粮库这样的“正规军”。事实证明，离开严格的法律监督和惩罚机制，“正规军”也不会铁肩担道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还未尘埃落定的“陈年旧事”，还折射出公众知情权缺失的老问题。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类似事件湮灭在公众视野之外。仔细想想，“问题大米”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更多的问题。据称，湖南大米镉超标是普遍现象，既然大米如此，面粉或其他农产品又何以堪？近期湖南省发布《湘江流域总体规划》，侧重生态保护和重金属治理，是否也与此相关？没有知情权的我们，无法不联想：湖南长期以来食品安全状况如何？在环境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这一局面还要维持多久？

在质监部门功能失灵，又缺乏惩罚机制的环境下，我们注定落后于真相。据有关调查，目前中国多地市场上约10%的大米镉超标。也许当我们在同情湖南民众时，正身受其害而不自知。目前政府正着眼于切实促进民生，那么，推动质监机制变革正当其时。

“作业拼爹”



□ 文/李英锋 图/李宏宇

浙江某单位工作人员小陈向记者吐槽，称单位领导动用9名下属为女儿做寒假作业。作业包括摄像、画画、写作文等。9人一共花了3天，熬了2个通宵才把作业完成。

写作业也“拼爹”，实在太荒唐。虽然“作业拼爹”与我们见惯的“传统拼爹”性质有很大区别，情节并不恶劣，对社会公平并未造成实质损害，但也是极不正常的。这种现象暴露出家长的不负责任，暴露出孩子的懒惰、逃避、应付的心态，暴露出学习诚信的缺失。“作业拼爹”非但不能帮助孩子，反而会伤害孩子——从小处看，让孩子失去了学习锻炼的机会，从大处看，则会助长孩子弄虚作假的习气。

但是，“作业拼爹”都是家长和孩子的错吗？不是。笔者以为，“作业

拼爹”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作业超前”现象，“作业超前”很可能才是真正始作俑者。先看新闻中的例子：9个员工，其中不乏一些专业人才，还另外请了电视台的“帮工”，花了三天两夜，才完成了作业，让12岁的小学生自己来，她得花多长时间？这道作业题涉及外出采景、绘画、拍照、摄影、写作、制作视频、上传网络等多道工序，也涉及多项知识和技能，12岁的小学生能独立完成吗？

所以，我们在指责“作业拼爹”现象的同时，更应该警惕和反思“作业拼爹”背后的“作业超前”现象，学校和老师（主要是小学）更应该对作业的难度进行科学理性的考量和把握。老师布置的要求学生独立完成的作业应该符合实际，应该在绝大多数学生的能力范围或潜力范围内，应该让孩子有独立完成的信心。

戴假肚皮装孕妇骗座 露馅后为何振振有词

□ 燕农

</